

美国文明的兴起（上卷）

(美) 比尔德 (Beard, C. A.),

(美) 比尔德 (Beard, M. R.)

商务印书馆

导 言

一国的文明史,如果论述精当,可以成为促进文明发展的手 vii
段。这种历史把生活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而不是对它的局部作
微观分析,因而应该比任何局部性的历史更符合阐发历史的需要。
只要历史的各个部分被继续分隔开来论述,每一部分必然是不完
整的,甚至会牵强附会的;这是因为,正如巴克爾^①所说的那样,
任何学科的哲理(就是它的真理)并不在它的中心,而是在它同所
有其他科学有着紧密接触的边緣。一部文明史不仅论述战争和政
治的各种表面现象,而且还探讨一个民族的内在力量的全部表现,
因此,它基本上是能动的,既使人注意到尚待探索的人的才智,也
暗示如何从外在必然性中求得解脱。通过它在各方面提出的尖锐
问题,它可以为自我分析判断和创造能力指明新的方向,从而有助
于形成一种更适宜的“思想气候”,有助于使制订高水平的计划、设
计或理想确立权威性地位。除了这样表现出力求从多方面理解一
个特定的社会戏剧外,一国的文明史还可以作为那种文明本身已
达到一定成熟程度的象征。凡是有资格自称精神上成熟的成年

^① 亨利·托马斯·巴克爾(Henry Thomas Buckle, 1821—1862年),英国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和实证主义社会学家。——译者

人,哪一个会承认自己仅仅属于历史的一个范畴——如战士、政客、赚钱能手、小说家、运动员、殡仪业者、新闻记者、丈夫、妻子、父亲或母亲——而再无其他抱负呢?当大地上的尘土意识到尘土的作用的时候,大地表面就开始发生了变化。

这不过是用另一种方式重述沃尔特·佩特^①的令人信服的论点,即要使艺术、科学、哲学和生活本身“及其所具有的爱、欢乐和赞赏的全部能力”开放出最绮丽的花朵,专心致志是个先决条件。要开创一个启蒙和奋发的伟大时代,“多才多艺和专心致志的人物”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只要艺术家、思想家和领导人过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潜心专业而漠视主流,他们便缺乏那种能使天才得到充分发展的知识和才能的全面性。如果把一个民族的过去仅仅描述为乡村闲谈或都市社会新闻那样水平的一连串插曲,那么,怎样才能培养和激励全面发展的人物呢?他们能够依靠什么样的要素茁壮成长呢?依靠一种纯粹哲学的抽象概念吗?依靠从可能比自己优越的邻人方面的借鉴吗?依靠远离当代现实但为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珍视的事物吗?依靠玉米 儿、电熨斗和专业研究中使用的术语表达出来的“价值”吗?

由于认识到甚至“美术”^②也必须生根于某种土壤之中,一位作家最近在我们的一份评论杂志上提出问题:画家是否也应以明辨事理为宜?这个问题与正在这里探讨的论题有密切的关系,因此至少有一个艺术团体对这样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热烈而又有卓见

① 沃尔特·霍雷肖·佩特(1839—1894年),英国散文作家和文艺批评家。——译者

② fine arts,包括绘画、雕塑、建筑、文学、音乐、戏剧等。——译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讨论。所有参加论战的辩论者都承认：仅仅临摹范本造就不出一个美术家，从来没有一件临摹作品在实质上是超过有创造才能的大师的作品。大家也一致认为：虽然一个低能者在挥毫和着色方面可能很巧妙，可是任何一个低能者都不可能成为绘画大师。他必须懂得“某些东西”并具备某些鉴别力。所谓某些东西是什么样的东西呢？某些关于他所描绘的人物和题材的特性，某些关于描绘这些人物和题材所要达到的目的。这个论点不费唇舌就得到了人们的承认。总的结论似乎应是：一个画家只要能欣赏旧的艺术形式，个人又具有才能，那么，他对自己生活和工作于其中的文明世界、它前进的动力、它的主导体系、它所追求的目标以及它的明显前途了解得越透彻，就越有充分的准备去取得那种能使文明得以进一步充实的艺术方面的成就。可是，怎样才能提高鉴别能力呢？投之于五里雾中是不行的。如果一个民族的历史是能体现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整个社会组织的一种基本原则，那么，它就应当提供用以砥砺人们鉴别能力的资料。这想必是埃默森^①曾有过的想法，他奉劝美国人，为寻求完美的人生，应坚守自己的岗位，并在历史为了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而分派给他们的岗位上努力创造自己的命运。 ix

如果艺术家必须懂得某些东西，那么，优美文学的作者和他们的评论家还用说吗？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如果不了解“三”这个数字以外的任何事物，他能够环绕那永恒的三角关系，刻画出男主角、反面人物和女主角吗？甚至把遗传视为天才决定因素的最坚

^① 拉尔夫·沃尔多·埃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年)，美国先验主义哲学家、散文作家和诗人，详见本书第十六章。——译者

定的信徒,也为环境留下一个漏洞,而生物学领域里最审慎的理论家则认为遗传和环境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总之,遗传和环境一分开来就毫无意义。至少可以这样假设,如果一位小说家极想成为伟大的作家,或希望被人类的判断宣布为伟大作家,而除这种判断以外别无吁求之处,那么,他怎能忽视他自己所继承的东西以及他书中的人物和情节所继承的特征呢?如果不了解那些属于地主贵族、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男女人物的出身以及在这几个阶级中普遍存在的各种冲突、典型和生活方式,他能够以卓越的技巧来描绘这些人物吗?从司各特^①的作品中抽掉封建主义,从狄更斯^②的作品中抽掉维多利亚时代^③的贫穷问题,从左拉^④的作品中抽掉近代城市的苦难,那么,还会留下什么东西呢?或者不管怎么说,那残余的东西还会有什么意义呢?难道今天的俄罗斯小说家是在按照 1898 年俄罗斯小说家的同样风格写作吗?到了 1950 年,他的后继者会用今天的方式写作吗?如果说不会,那么为什么说不会呢?我们不能避开这样的结论:随着文明的变化,哺育作家和伦理学家的营养物以及他们用以创作的素材也发生了变化。因此可以这样说,一种文明的一部理想的历史在揭示作家、观众和演

① 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 1771—1832 年),英国诗人、历史小说家,其最著名的历史小说《艾凡赫》揭露了诺曼贵族的骄横残暴和撒克逊农民的苦难。——译者

② 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 年),英国小说家,其长篇小说《奥利佛·推斯特》和《尼古拉斯·尼克尔贝》描写处于资本主义社会底层的人们的受压迫和穷苦无告的生活。——译者

③ 维多利亚时代,指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在位的年代(1837—1901 年)。——译者

④ 埃米尔·左拉(Emile Zola, 1840—1902 年),法国小说家,所创作的由二十部长篇小说组成的《鲁贡玛卡尔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揭露资产阶级的荒淫无耻和城市平民的苦难。——译者

员的相互关系的同时,还会有助于对作家本人解释作家,对观众解释观众,对演员解释演员。这部历史写得越深刻、愈广泛和愈符合现实,它对文学和文学批评作出的贡献可能也就愈大。

关于这方面,不妨着重指出这样的事实,即艺术家和作家是靠人们的赞助生活的。历来就是如此。那些为法老们^①雕刻大门的雕刻家,是注意到他们的保护人所存有的愿望、兴致、抱负和权力概念而进行创作的。中古时代的艺术家为贵族与贵妇、商人和教士而创作。近代小说家也必须把市场和文学批评家铭记在心。很难想象,美国革命女儿会^②会大量购买《埃尔默·甘特里》^③这种小说。因此,谁会并且的确长期追求那种纯粹、高雅和超凡脱俗的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呢?最伟大的艺术,不论是造型的还是用文字表达的,有从虚构的现象中产生出来的吗?通过一国的文明史向艺术赞助人显示艺术如何从过去的状况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也许可能为艺术创造出一种新的环境,从而有助于使所描绘和解释的文明获得有意识的发展。

然而,决不可以认为,一国的文明史主要同艺术和文学——所谓文化成就——有关,因而设想能把它们同有机体的其余部分分隔开来而不致造成实质性损害。固然,有一种传说的大致意思是:

① 法老(Pharaoh),是古代埃及统治者的称号。——译者

② 美国革命女儿会(The 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由参加美国革命战争者的后裔组成的爱国主义妇女团体。始创于1890年,总部设在华盛顿,分支机构分布在全国一千五百多个大小城市,后发展为一个保守的组织。——译者

③ 《埃尔默·甘特里》(*Elmer Gantry*)是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1885—1951年)于1927年出版的小说,书中主角甘特里是个伪善的牧师,灵魂丑恶、手段卑鄙、到处招摇撞骗,此书揭露了美国宗教生活中的虚伪和欺诈。——译者

xi 艺术和文学的创作者必定会用嘲笑的口吻谈论商业和工业，把它们看作有别于“精神努力”的“物质追求”。于是作为回敬，注重实用的人有时就惯于把艺术家和作家说成是为了体面而不妨予以容忍的纯粹奢侈品（非常接近疯狂的边缘）。但老实说，造型艺术是以实用手工艺为基础的，而近代的商业和工业也不能在一种智力的和艺术沙漠中繁荣起来。在社会哲学史中，最有趣的莫过于不肯痛痛快快地承认这样的事实，即近代工商企业依赖西方文明的整个遗产——它的宗教戒律、它的法律和道德准则、它的工艺和技艺、它的科学和艺术，以及它的兴趣和抱负。举例来说，要是没有数学或设计，怎么能够经营这样的企业呢？假设一个精明的资本家在非洲的一处丛林中建立一所工厂，比如说制造电工器材吧，然后在那里附近寻找合格的劳动力供应和一个识货的市场，这该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

工商企业一向是建立在文明的遗产之上的，它的经理很可能要具备的文化程度正好同他们对文明遗产历史的了解程度成比例，假如没有这种遗产，他们就会成为无知的经济幼儿。还不仅是这样。他们既是艺术的顾主，转过来又是文明的创造者。思想和生活资料是以某种不可思议的方式一同发展的。

关于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就是火药的发明。乍看起来，火药似乎同文明无关——至少同那种狭隘地只从艺术和思想方面来研究的文明无关。但是，正如巴克所指出的，火药连同它那伴随而来的机械使得有必要培养胜任的军事专家，并使每个国家的一大部分居民摆脱了在以长矛和弓箭作为战争武器的时代落在全体自由民身上的战斗责任。“就这样，大批的男子逐渐捐弃了他们旧有的

好战习性；似乎也可以说，由于被迫转入平民生活，他们的精力就得以用于社会的一般目的和从前所曾忽视的和平技艺的修养方面。其结果是：欧洲人的才智不再像以往那样不是专门用于战争就是专门用于神学，而是在这个时候开辟了一条中间道路，因而创造了现代文明赖以发端的那些重大的知识部门。”这个论点即使被 xii 过分强调了，也还是合乎实际的。此外，火药还促成了那些置身于城堡和城墙的护卫之中，闭关自守，严阵以待的封建贵族的没落，也导致了具有其本身世界观和推陈出新、丰富多彩的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兴起。如果说单单火药这样东西就能“对文明作出这么多的贡献”，那么，对于现代企业所掌握的电力可能作出的贡献又该怎么说呢？从现在起再过 5 个世纪以后，难道不可以把一种新的道德和思想体系的初创追溯到第一部旋转的发电机吗？

工商企业既然从复杂的文化遗产中产生，而其本身又是文化的一个创造者，因此如果没有文明，它就不能生存和发展。有时，人们毫无根据地认为劳动力的雇主只希望有机器人来照料他们的引擎和机轮。在一种非常有限的生产体系，比如说有些作家喜欢赞美的那种为显贵制造精品的生产体系中，资本主义无疑地有可能把工人当轮齿来使用而取得小规模的成功——假如轮齿能够遵循一项总设计的话。但大规模多样化的生产体系是决不能在一个纯粹由机器人操作的国家里出现的；即使偶然从国外引进，它也不能长期维持下去。人类机器人只需要食物和住处。商品的图案、色彩、款式和花样对于机器轮齿来说是毫不相干的。因此，假如现代的资本家真像人们通常所描绘的那样是实利主义的、幼稚的和对文化漠不关心的，那么，由于内在的矛盾，他们的社会制度是注

定要消亡的。假如像人们所断言的那样,以机器工业为基础的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就在现行制度的前方,它也肯定需要一个有文化的民族来加以管理。

此外,妇女们无论在战时或平时,除了自上到下被卷入人类进化的整个进程而外,作为遗产的继承者和艺术与科学工作者,还同
xiii 现代工业围绕它旋转的心理中心即商品市场,以及现代工业在那里影响全部文化的外围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关系。虽然从恺撒的时代起,坚强的男子一直在痛斥“那些助长女人气的事物”,但无情的事实是:如果没有那些事物,广阔的世界里就至多只有窑洞、兵营或简陋的寺院围墙了。不管从历史上看情况究竟如何,今天的妇女是包括文学和艺术在内的各种商品的主要买主,从而在广大的范围内也成为工商企业和时髦风尚的指导者。根据最近的估计,美国妇女每年按超过 30 亿美元的个人收入缴纳所得税;接受由男子遗留下来的财产的 70% 和由妇女遗留下来的财产的 64%。一位统计学家曾忍不住预言说:假定现在的财产转移率持续不变,到了 2035 年,国内的全部财产都将落入妇女之手!

那么,男女平等主义者所发表的文明的提高不会超过它的妇女地位这一名言,又会变得怎样呢? 不管这一论点对于建立在战争和教士权术上的社会是否适用,对于为多样化的大众消费而实行大规模生产的工业体系来说,它似乎一定是适用的。暂且不谈妇女同艺术和文学的关系,但人们必须承认,她们作为商品买主的权力使她们在现代文明的开展中具有一种战略地位。因此,妇女也应该像思想一样被吸引到历史的主流中去。

关于一国的文明史可能提供的建设性贡献,就谈这么一些。

在否定的作用方面,也有些东西是值得一提的。这一类型的历史按它的性质而言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如果被处理得恰当,它能排除这样一种想法,即国家是一些出于比较高超的智慧或较低的刚愎自用而已经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的有道德的个体。它对于有人把文明比作一种外衣,任性的男女由于无知或自负而坚持穿着或者会随意穿上和脱掉这一想法,同样起到摧毁性的作用。它并不称颂沙文主义的虚荣志趣和阴谋诡计,并经常提醒人们要提防叛逆对才智的危害。它把某一特定文明作为成长中的有机体来对待,因而对于以令人惊异和迷惘的所见所闻为根据的平面观测来说,它是一剂解毒药。它不假托新闻描述去支持国内的或国际的政治怨恨。xiv

但对于所有这些概括意见,我们附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如果设想明智和处理恰当的话”。一国的文明史是不能用拼凑法规、法令、政治演讲、报纸文章、私人信札、回忆录和外交照会的办法来写成的。这样一种著作的作者在开始时必须接受“历史是继往开来的哲学”这一原则,而在选材和解释时又必须同那种令人困惑难解的命题不断地进行斗争。犯错误的风险蹒跚而来;干出蠢事的危险却大一些。但是,可供那些不满足于把生活当作缺乏有机结构的相继发生的事情以及把历史当作一连串奇闻轶事来对待的人选择的,是什么办法呢?也许,那些在甚至没有途径的地方力图寻找途径的人,即使仅仅通过他们的错误,也能促进寻找途径的工作。那些为艺术家创造框架的人,并不是没有他们的作用的。竖立起某种能使潜心于专业的行家们看得见的水准基点或论点,可能有助于使各方的意见趋于一致的过程,而各国的文明史就可能从这

过程中产生出来,为整个文明的充实丰富作出重大的贡献。

早在 1752 年,伏尔泰就曾为这一类型的历史发出过呼吁,并企图在他论“大帝王治下的法国”那部著作中作出榜样。就是他这本书的书名《路易十四时代》也含义深长。他没有把它称为《路易十四不可思议的奇迹般的功绩——摘自他的生平和事迹实录》,也没有把它命名为《路易十四:他的爱好》。他在序言中声明,他打算描写的“不是单独一个人的行动,而是整个社会的特征”。军事上的成就伏尔泰只扼要地叙述;国内政治大事占了适当的篇幅;也描绘了教会问题。但在旧的历史的主要内容之外,还加进了商业、财政、科学和美术的进步等部分。在另一卷研究历史的著作中,伏尔泰解释说:“我想写的一部历史,不是关于战争的而是关于社会的历史;想弄清楚人们在自己的家庭之内是怎样生活的,以及他们通常有哪些艺术修养……我想知道人类是经过哪些步骤才从野蛮状态过渡到文明状态的。”尽管这一论点和论证都非常卓越,可是遵循传统的作家们至今一直不敢接受这一挑战。当新手亨利·托马斯·巴克尔试图应战时,他那令人伤感的失败比他显著的成就更广为人知。每一次这样的失败都增加了使探索者们感到烦恼的沮丧和气馁。

可是,不难想象,在一辆准备驶往某一目的地的快车上遭难比起在一辆停在栅栏围得很严密的贮木场旁轨上的货车里逐渐腐朽,也许要好得多。

上 卷

农 业 时 代

第一章 英国的殖民奥秘

3

美洲的发现、殖民和扩张,仅仅构成人类在地球表面漫长而无休止的活动的一个方面。当信史的帷幕初次在人类舞台上升起时,原始部落、武装帮伙和军队早已蹂躏了带有小径和大道的平原和山谷,并且在茫茫大海上驾舟航行了。从时间上的制高点来观察,各民族的戏剧似乎不过是一部叙述人口迁移和文明变迁的记录,而他们所建立的有深远影响的帝国——如巴比伦人、埃及人、波斯人、阿比西尼亚人、雅典人、罗马人、蒙古人、土耳其人和满族人的帝国——在宇宙万物的流动中不过是体现出明显的停顿和集中的转瞬即逝的历史阶段。 4

希腊最早的哲学家之一阿那克西曼德^①在公元前 500 多年就得出了惊人的结论,认为他用锐利的目光观察到的宇宙是个无边无际的洪流,始终不停地运动着,抛出新的形体和新的生物,然后按命运的规律再把它们吸入它那贪婪的无限空间——旋转的天体、起伏的潮汐、生长的谷物、游牧的畜群、孱弱的人类及其为争一日之长短而扬扬自得地建立起的一些渺小体系,以对抗不过象征

^① 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公元前 611? —前 547?),古希腊爱奥尼亚地方的哲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生平事迹不详,从他遗留下来的著作残篇中得知他的学说含有朴素辩证法的思想。——译者

有一种不变的力量即一切实体的本质所体现出来的永恒——这种说法也许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即使用近代数学的术语来表达,也可以说明一种纯机械论的哲学以其朴素的性质而颇引人注目,但近代一位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提醒我们说,单单运动不能说明方向或生命力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位历史学家奥斯瓦德·斯宾格勒^①提醒我们说,“有一种与关于无机物的逻辑、即关于理解力和被理解物的逻辑相对立的有机逻辑,那就是关于一切实体的本能的、酷似梦幻的逻辑——一种与外延逻辑相对立的定向逻辑。”

在阿那克西曼德以后 2000 多年,即在 19 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试图解释历史的无穷无尽的变化问题,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的进化就其最深邃的性质来说,是神圣精神的渐进的启示。由于黑格尔假定上帝必然是一切事物的绝对主宰、造物主和支持者,他把古往今来所传播的文明的千变万化的时代模式仅仅看作构成宇宙基础的伟大理念——即“按照绝对合理的方式规划世界以实现其目的的一种无限力量”——的部分反映。在他看来,历史上所有兴起和衰亡的国家不过是一场庄严角逐中的小卒,每个小卒有其需要完成的使命,各有其英雄人物作为时代的公仆以贯彻当时注定要实现的理念的那一方面。

据这位哲学家看来,上帝所选定的方法是正、反、综合的运动——每一项制度、每一个概念和每一种情况都从无限深处唤起它的对立面和异议;两者之间的矛盾最后达到调和的综合或解决。

^① 奥斯瓦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 年),德国哲学家,对数学、博物学、艺术、历史等学科都有研究。他在 1914 年完成的《西方的没落》一书在西方曾产生影响。——译者

虽然按照逻辑推理,似乎意味着这种变化将来一定会像过去一样持续下去,可是黑格尔事实上声称,长期变化过程的目标已经在德意志^①和普鲁士王国达到了:上帝经过许多世纪的辛勤劳动创造出了黑格尔发现自己处身于其中的理想境地。可是,那种天真的信念并没有妨碍他的伟大假设深刻地影响了近代思想。如果说历史学家用不那么炫耀的概念——用事物的具体关系而不是用基本原理——来进行研究,并在近来已经倾向于避免黑格尔的信条,那么神学家和政治家直到最近还在黑格尔的信条中寻找有力论证的力量。

黑格尔的世纪临近结束的时候,一位德国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在探索帝国主义的原动力时,把帝国主义的发展过程归纳为人类各社会之间在广大地球上经久不息地争夺给养基地和世界天然资源的分配的斗争。这个理论虽在其普遍性方面过于笼统,但不是没有例证的。3000 年或 3000 多年的期间,古代若干民族和帝国缔造者的冲突都以占有富饶的尼罗河流域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为目标,因为那里容易获得供养稠密人口的粮食,而统治阶级也能毫不费力地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在这些肥沃地区兴起并有暂时安全保障的每一个强大帝国,都相继为觊觎它的土地和积累的财富的能征善战的游牧部落所征服。对辛勤积聚的财富的掠夺成了勇士的酬劳。当雅典帝国鼎盛时,不下 1000 个城邦向它的国库进贡,遍布地中海的赚钱商业使它的商人富裕起来。伯里

① 德意志指 1871 年以前中欧一些操德语的邦国的总称。——译者

克利^①时期是花了很大的代价达到的。由于迦太基帝国^②把北非、西班牙南部、科西嘉、撒丁岛和西西里的一半都包括在它所征服的领域内，它首先是个商业国家，其主导思想是要通过武力或贸易垄断去掠夺或榨取隶属它的行省，以尽量搜刮财富。

在罗马的利剑面前，富裕的迦太基陷落了。当两强在西西里岛上对峙时，不仅是面临灭亡的恐惧，而且是获利的希望，使罗马议会通过了发动战争的决议。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引证波利比乌斯^③的权威意见：“军人对人民说，他们可以从战争中获得重大的物质利益。”在这一简单的话语中，透露出那种强烈的欲望，它驱使共和国的军队越过了意大利的边界，在许多世纪几乎毫不间断的对外侵略中终于把罗马帝国扩张到了阿拉伯的沙漠和苏格兰的积雪地带。也许正像那位近代殖民地总督寇松勋爵^④作为辩解曾经说过的那样，主要动机是寻找“可以进行防御的边界”——这大概是任何军事指挥官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尚未找到的东西。但这位勋爵阁下仍然不得不同时承认：罗马在征服了一片广大地区以后，“完全从财政收入着眼”来看待它的各个

① 伯里克利(Pericles, 约公元前 495—前 429 年)，古希腊雅典城邦的著名政治家；从公元前 443 至前 429 年，他连任雅典 10 将军委员会的首席将军，成为雅典的最高领导者。希腊史上一般把这段时期称为伯里克利时期，是雅典文化、政治、武功的极盛时期。——译者

② 迦太基帝国是古代非洲北部奴隶制城邦，公元前 8 世纪到公元前 7 世纪发展成为西地中海的强大帝国。——译者

③ 波利比乌斯(Polybius, 公元前 198? —前 117? 年)，古希腊历史学家。——译者

④ 乔治·纳撒尼尔·寇松勋爵(Lord George Nathaniel Curzon, 1859—1925 年)，英国政治家，毕生从事外交工作和研究外交关系，1899—1905 年任印度总督，残酷镇压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译者